

## “女子难养”论与孔子“出妻”说

### ——孔子妇女观研究中的两个重大问题

杨朝明

很久以来，人们大多认为孔子“轻视妇女”。现在，人们综合观察史料，改变了孔子“迂腐保守、顽固不化”的惯常认识。例如，2007年，中华书局与山东曲阜联合进行了一次“《论语》心得征文比赛”，在候选获奖的文章中，就有人对孔子的爱情观进行研究，认为作为圣人的孔子同样也是“性情中人”，孔子不是一尊冰冷的塑像，更不是道貌岸然的伪道学先生，他也会对爱情和人类各种美好情感由衷地颂扬和感同身受。然而，文章最后，却又“客观”指出：人无完人，圣人亦不例外，孔子还有“出妻”、“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之说。这样的观点十分具有代表性。

事实上，在许许多多的人们包括学者眼中，孔子“出妻”说以及他的“女子难养”论，的确是孔子“轻视妇女”的“铁证”。然而，我们在研究中，竟然发现这两项孔子“轻视妇女”的证据都不能成立。在人们尤其是女性对孔子妇女观进行“鞭挞”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事实却是后人误读史料、误解孔子，严重影响了对孔子思想学说的正确理解。在今天我们祭祀孔子、纪念这位伟大圣哲的时候，这样的误解更亟须得到澄清。

### 一、孔子“女子难养”说新论

《论语·阳货》记孔子之言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孔子斯语，可谓人人皆知，影响极大！在这里，“女子”与“小人”并言，而且皆被视为“难养”。于是，长期以来，人们遂以之为孔子“轻视妇女”的证据而家喻户晓。近代以来，受平等主义、女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不少人更是由此对孔子及此语耿耿于怀；殆至现代“百家讲坛”再到人人解经，由此语所引发的争议更是纷繁复杂。这句话成为孔子是否轻视妇女乃至如何看待孔子的关键问题，不难理解，弄清孔子斯言的本义十分重要！

#### （一）对“女子难养”说的种种理解

孔子轻视妇女？！孔子竟然将占人口半数的女性给一口否定了？！有人会说这可以理解：孔子处在父权家长制时代的春秋之末，女性的地位已经很低了，被歧视也很正常，孔子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

然而，早期儒家特别是孔子思想具有浓重的人本主义色彩，孔子说“仁者爱人”，难道不包括女性在内，现实中，还真的有人认为事实正是如此。蔡尚思曾写过一篇有名的文章《我爱孔子，我更爱真理》，说：“孔子大谈忠恕之道，但却不能付诸实践，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诸如推父母，推夫及妻，推男及女等。周公、孔子制礼的片面性，早经谢晋(谢安)太傅夫人和王文禄指出，男子制礼专为己谋。”又说：“男女性别是优劣品质的大问题。孔子站在男子的立场歧视女子的表现有多种。”蔡先生的基本论据不过都是孔子斯語。

孔子的一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引发了人们这么多的思考，恐怕是孔子始料不及的。更为重要的是，此语不仅被视为孔子歧视妇女的有力证据，也直接影响到对孔子思想的整体认知。尤其近代以来的激进时期，它是历来妇女地位地下的开端，是“男尊女卑”观念的始作俑者，也成为孔子难以推卸的“历史罪状”。

上世纪后期以来，随着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复兴，诸多学者力图从新的角度进行解释，仅仅对《论语》中孔子“难养”说的19个字，就有许多“正解”、“新解”、“辩证”、“我读”之类出现。如有的学者着意对“与”字进行重新解释：认为女子支持、赞助小人，并与小人结党营私；有的认为是说“将女儿嫁给道德败坏的小人”；有的训“逊”为（小孩子）“听话”，训“怨”为（小孩子）“哭号”等等，以“难养”专指“小人”，这可谓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女子”。还有的倾力于对“女子”进行解释，认为“女子”为复合词，应训释为“女、子”或“女”加“子”；有的则释“女子”为“汝子”，译为“你这个人”、“你那里的年轻人”、“你的儿子”或“您这位先生”、“你们几个学生”、“妻子和儿子”等，进而认定孔子其实“同情女性、尊重妇女”。这类解释看起来新颖别致，苦心孤诣，却显得牵强，有“美圣”、“崇圣”或“为圣人讳”之嫌。

除了《论语》中的这句话，其他可以判定“孔子歧视女性”的证据实在不好找到，如以孤证立论，“片言折狱”，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那么，孔子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孔子的本义到底如何？我们认为，要理解孔子此语的真实含义，最为核心的应当是对其中关键词语的内涵有准确把握。

毫无疑问，在经典诠释中，应坚持经典溯源的方式，以经典解释经典：回到孔子所传承的文化和生活的那个时代，方能探得孔子“女子难养”说的真实含义。

值得注意或者必须注意的是，在文化观上，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孔子所“述”者何？典籍中说得十分清楚，《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时代，齐国就有人说：“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家语·本姓解》）孔子遵循尧、舜之道，效法文、武之制，显然，尧、舜、文、武等古代先王对孔子影响很大。尧、舜时代较远，周代制度就是“损益”前代而来，按照朱子的解释：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论语集注》）因此，孔子应当更加推崇文、武、周公

之制。由此我们想到，孔子崇尚“文武之政”，熟知周代文献，那么，有关孔子的一些“拿捏不准”的言论与争议，可以结合周代典籍中的言说进行理解，这或许是一个十分切实合理的途径。

## （二）周初“小人难保”观念的启示

孔子晚年曾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孔子对被后人视为“儒家元圣”的周公可谓魂牵梦绕，由此我们想到，孔子的言论应该与西周初年的周文王、武王、周公言论属于相同的“话语系统”，那么将人们理解歧异的孔子“语录”与周初思想家结合比对研究，应该是一条十分合理的途径。

事实上，孔子时代，周初的历史文献大量存在，《礼记·中庸》记孔子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这使孔子得以了解与效法“周政”。在阅读周代相关历史文献时，我们欣喜地发现，周初存在的一个观念对于理解孔子“女子难养”说颇具启发意义，这就是“小人难保”。我们相信这是解决这一聚讼不已的学术公案、打开孔子此语之谜的钥匙。

《尚书·康诰》记周公告诫康叔之语曰：“呜呼！小子封，恇瘝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当时，周公刚刚平定管叔、蔡叔与殷人勾结的叛乱，《康诰》就是这种背景下对被封于卫地的康叔的嘱告之辞。这里，“小人”指百姓、小民。孙星衍疏引《释詁》云：“保，康，安也。……小民不易安也。”小民不易安，应当在治理时保持一颗敬畏之心，因为“天威之明，惟诚是辅”，在民情中可以得到应验。欲安其民，就应当重视他们，就要尽心竭诚，而不能苟安逸乐。总之，因为“小人难保”，就应当重视“小人”。

在《逸周书·和寤解》中同样有“小人难保”之语。该篇记周武王的话说：“呜呼，敬之哉！无竞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难保。”这里的“小人”同样指小民、百姓。依《周书序》，本篇是周武王将灭商时，在商郊“明德于众”之作。武王要求众人重视小民，不能与小民争利。尤其重要的是，这里说因为“小人难保”，故应“惟事惟敬”。小民很难护养，就要事事施之以敬，这正是周人传统的“敬德保民”思想的体现。

在先秦文献典籍中，“小人”一词比比皆是，均与“君子”对举。例如《诗经·角弓》中说：“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尚书·无逸》中有“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艰难”。君主重视“小人”，说明小人阶层并非毫无地位。与《论语》同时代的《左传》、《国语》等典籍中，“小人”也大都做地位低下之人解，如《左传》襄公九年有曰：“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又如《国语·鲁语上》曰：“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新公布的清华简《保训》篇中有“昔舜久作小人，亲耕于历丘”之语，舜当初所做的“小人”也是此义。郭店楚墓竹简有“刑不隶（逮）于君子，礼不隶（逮）于小人”，这就是《孔子家语·五刑解》和《礼记·曲礼》中的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小人”是商、周社会中从事农业等体力劳作、地位较低的平民，包括一般庶民、鄙夫、野人，是王、侯、卿、大夫、士之外的普通百姓，是相对于为政者、大人、君子的身份地位的统称。

查《说文解字》，其中明言：“保，养也。”是则“小人难保”就是“小人难养”。不难理解，孔子强调“小人难养”，也一定是秉承周人的牧民思想，针对各层各级“养民”者（即所谓统治或管理者）而说的。

原来，这里的“小人”并不是指我们惯常意识中的那些“道德低下的人”！在《论语》文本中，“小人”当然有与“道德高尚的君子”相对的意义，但其中有很多却正是指的“平民”、“普通百姓”。如《论语·子路》记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就不是对弟子的道德谴责。

孔子思想与文王、武王、周公等一脉相承，由周初文献我们知道，孔子说“小人难养”不仅不含有轻视“小人”的意义，反而是反映出他对这一群体的重视，那么，孔子说“女子难养”应该也不是什么轻视女子？

### （三）“女子难养”说不是轻视女子

在孔子的表述中，无论“女子”还是“小人”，其所谓“难养”，具体在于“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也就是说，“女子”、“小人”具有自身的特点，对他们既不可“近”，也不可“远”，因为把握不当，容易造成“不逊”或者“怨”这样的消极结果。

所谓不可“近”、不可“远”，是一个需要具体掌握好的分寸、尺度。所谓“不逊”，就是不驯顺；“怨”则是埋怨、怨愤。《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有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恶之不敢远，好之不敢近。”作为普通民众的小民，一般不容易领会“君子”的意图，在与君子相处时往往会产生茫然、不知所措。

另一方面，君子对待民众就应当注意不“近”、不“远”。《孔子家语·好生》记：“孔子谓子路曰：‘君子以心导耳目，立义以为勇；小人以耳目导心，不逊以为勇。故曰退之而不怨，先之斯可从已。’”孔子认为，君子用心指使耳目，把道义作为勇的基础；小人用耳目指使心，把不驯顺当作勇敢。所以说君子被屏退也不抱怨，让他带头也能做好表率，使别人能跟着他做。在《论语·阳货》“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一章之前，就有子贡所说“恶勇而无礼者”的话。所谓“勇而无礼”，就是“不逊以为勇”。君子可以“退之而不怨”，而对待小人，如果“退之”，就难免出现“怨”，这其实就是“远之则怨”。

在《孔子家语·好生》篇中，还有曾子的类似表述。曾子说：“狎甚则相简，庄甚则不亲，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欢，其庄足以成礼。”小人既然确实有这种不知“远”、“近”的茫然与狭隘，君子应如何措手处理？曾子认为，既不能过分亲近，也不能过



分庄重而显得疏远，过分亲近就会简慢，过分庄重就不能亲近。所以，君子般的亲近足以结交朋友并彼此欢悦，君子般的庄重足以成礼。孔子非常赞赏曾子的言论，认为君子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就要不“狎甚”、不“庄甚”，以“礼”约之，以保持好的关系。这其实正是孔子言说“小人难养”的本意所在。

对“小人”如此，对待“女子”自然也是一样。在《论语》该章中，“女子”与“小人”是被绑定的并列主语。梁漱溟先生说得好，孔子的那些话，包含了他“对于人类心理的认识”，“孔子学说原是从他对人类心理的一种认识而来”（《梁漱溟先生论儒佛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孔子熟知历史知识，了解民性。他一定认识到，商周时期女子社会地位较低，受教育程度远远不及男子。在经过他整理的《尚书》中，就有商纣王妃妲己“牝鸡司晨，惟家之索”的说法。春秋时期的家庭结构更是男主外、女主内，很少参与公共社会活动。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她们受到历史条件的种种局限，因而大多数女性缺少文化教育，极少社会交往，难有志向抱负，视野不能开阔。历史上对《论语》的注解，也多从女子性别特征着眼，遂有所谓女子“其意浅促”、“无正性”、“志不在义”、“惟酒食之议”之类的理解。其实，孔子说女子“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是他对女性在心理情感依赖倾向的认知，究其原因，既有文化教育问题，又有心理性格素质问题。

不难理解，孔子此语是从政治管理的角度对“养”者即君子所说的，这是春秋社会历史史记的反映。孔子特别强调要了解“民性”、“民情”，《孔子家语·入官》记孔子说：“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既知其性，又习其情，然后民乃从其命矣。故世举则民亲之，政均则民无怨。故君子莅民，不临以高，不道以远，不责民之所不为，不强民之所不能。”这其实就是一个“度”的问题。对于“女子”与“小人”，都要注意“政均”，不能“近”，也不可“远”，以更好地让他们恭敬、不怨。朱熹也是这样理解的，他认为是“庄以莅之，慈以畜之”。

就政治管理而言，孔子此言是说对待“女子”与“小人”都应当心存一份敬畏和戒惧。周初武王、周公说“小人难保”丝毫没有轻蔑“小人”之意，那么，我们也可以确定，尊崇和效法周政的孔子言“女子难养”，也同样不会带有任何轻蔑、歧视的意味。孔子的意思是，不论为人处事，还是为政治国，都必须处理好与“女子”、“小人”的关系，对于为政者而言，这更是必须慎思的问题。对“女子”和“小民”，需要注意如何与他们相处或役使他们，要取得他们的拥护、理解与支持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他们过于亲近，他们就难免简慢而不驯顺；如果疏远了他们，就往往会产生怨愤。孔子此语，也可能包含有对女子和小人的重视、关注与深切体察。

## 二、孔子“出妻”说及相关问题

孔子及其思想学说的影响既深且广，因而他的身世和他的婚姻家庭也往往受到关

注。在相关讨论与研究中，人们常常会看到有关孔子“出妻”的说法，以为孔子曾经休妻离婚，并且还由此还出现了孔氏数世都曾出妻的说法。可是，在对相关材料认真考察之后，我们发现这些都出于后人的误解，与史实不符。

### （一）孔子“出妻”说的影响

孔子“出妻”说认为孔子曾经“休妻”、“离婚”，还有人进一步将孔子的婚姻问题与所谓“那时的男尊女卑”联系起来，认为孔子“出妻”是把妻子“休出”，这不完全等同于现在所说的男女双方的平等离婚。

孔子“出妻”说流传已久，影响很大。现在有人举办孔子文化普及活动，曾有180对夫妻面向孔子像共同宣誓“永不离婚”，于是，不少人便冷嘲热讽，认为这是“搞怪”、“好笑”、“非常荒诞滑稽”，因为“孔夫子他老人家恰恰是离过婚的”。据说，某年台湾地区立法委员选举，有一位参与角逐者曾有过多次婚姻，为谋求妇女选民谅解，该人竟放言孔子曾休妻出妇。在他看来，圣贤既然也有离婚前科，则又何苦苛求凡人皆须鸳鸯偕老。

对于孔子“出妻”之说及相关问题，历代学人多有考证，却至今仍然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孔子夫人为宋国亓官氏，今之亓氏为其后人。有意思的是，因为有孔子“出妻”说法的存在，亓氏家族竟然流传有“亓孔不联姻”之说，现在还有亓氏后人对“孔子出妻”颇愤愤然，以为“孔夫子休妻是亓家的奇耻大辱”，所以告诫子孙“千万勿与孔家结亲”，认为“这家人头难剃”。（《国文天地》第24卷第11期，总第275期，2008年4月1日）

孔子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孔子影响较大的伦理学说，都很容易使人联结到他的生活实际。所以，有人愤慨地质疑：“假设孔子果真休妻毁家，则有何面目谈论人伦纲常”？

### （二）孔子“出妻”说的真相

考察前人关于孔子“出妻”之说的叙述，其实都是根据《礼记·檀弓上》的记载。其中说：

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对此，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的解释是：“时伯鱼母出，父在，为出母亦应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犹哭，则是祥后禫前。祥外无哭，于时伯鱼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此是从伯鱼为母亲服丧的时间，确定伯鱼母被出，即肯定孔子曾经休妻。

孔颖达这里所谓“伯鱼母出”应该就是孔子“出妻”的最早出处了。期，是古代丧服名称，指一年时间。这里的“期而犹哭”，是说伯鱼在为母亲丧一年之后还没有除去丧服。

但是，孔颖达所说是严重问题的。《仪礼·丧服》中说：“……期者，父在为母，妻，出妻之子为母。”这里说的是“期”的三种情况：第一，母死，父在，为母期；第二，妻子死，丈夫为妻子期；第三，出妻之子为母期。《礼记·檀弓上》说“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显然是违背了第一种情况的丧制规定：母死，父在，为母期，过期则当除服。出母无禫，期可无哭。伯鱼丧母，期而犹哭，忘却其父孔子仍然健在。故孔子责之，伯鱼遂及时改正。孔颖达显然是由此就联想到了“出妻之子为母期”，而忽略了“父在为母”的第一种情况。

那么，为什么不是第三种情况？为什么不是伯鱼以“出妻之子”的身份为母亲服丧？因为《仪礼·丧服》在上述引文之后，接着还有“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的记载。所谓“出妻”，即被休之妻；所谓“出母”，乃是生身之母。如果被休的妻子去世，他们共同的儿子如果是丈夫的继承人，即使生身母亲去世，儿子也不能为之服丧一年。孔子只有伯鱼这一个儿子，伯鱼是孔子的惟一继承人，他作为孔子之“后”没有任何问题。按照《仪礼·丧服》的规定，如果伯鱼母亲被“出”，伯鱼之母去世时，他是不能为母亲服丧的。这就是说，《仪礼·丧服》的规定证明，伯鱼在母亲死后“期而犹哭”的事实，不仅不能说明伯鱼之母曾经被“出”，反而应当是孔子未曾“出妻”的有力证据。

### （三）所谓“孔氏三世出妻”

与孔子“出妻”说紧密相连的，就是所谓“孔氏三世出妻”的说法。所谓孔氏“三世出妻”，指的是孔子、伯鱼、子思三世休妻。也就是说，孔子家族不仅孔子休妻，孔子的儿子孔鲤（伯鱼）、孙子孔伋（子思）都曾休妻。其实，经过认真研究，孔子的子孙同样都未曾“出妻”。

对于所谓“孔氏三世出妻”，历代学者同样均有讨论与考证。例如，朱熹《朱子语类》、宋罗璧《罗氏识遗》、清袁枚《随园随笔》、清钱泳《履园丛话》、清周安士《安士全书》、现代人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等。但是，大家的认识同样存在分歧，有人认为确有其事，有的则否定这样的说法。今有不少学者未加细究，疑者信者都不乏其人。还有或者存疑，或者不解。孔氏三代竟然都有“出妻”的经历，实在令人疑惑！

其实，如果认真考察，历代学者认定“孔氏三世出妻”，其所根据的同样也都是《礼记·檀弓》篇的相关记载。《檀弓上》记曰：

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

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能安？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丧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上，名白，孔子的孙子孔伋（即子思）之子。所谓“丧”，这里是指丧礼，其中包括戴孝、守墓、哀哭等治丧与守丧的礼仪。《檀弓》所说“子上之母死而不丧”，是说子上的母亲去世后，没有为她举行丧礼。这里关键是子上母亲的身份，文中说她为“出母”，那么，何谓“出母”？不少人将“出母”混同于“出妻”，其实，两者有明显差别，《礼记·檀弓上》所说“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同一句子中有“出妻”与“出母”，细究其意，二者不能相同。

其实，以前早有学者指出，“出母”就是“生母”的意思，与“庶母”不同。例如，钱泳《履园丛话》就曾经议论关于“出母”的问题。例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康公，我之自出。”钱泳说：“出之为言生也，谓生母也。”他认为，《檀弓》中的记载表明，子上之母为子思之妾，非为正妻，如此而已。他说：“《檀弓》曰‘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盖嫡母在堂，不得为三年丧耳。其曰‘为伋也妻是为白也母’者，正其妾之谓也。必白为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终丧故也。……然则子上之不丧出母，生母也，非见出于父之母也，更无待辨，何疑乎子思有出妻之事，而兼疑乎伯鱼为出母之丧哉！况《檀弓》止有出母字，并无出妻字。后人因出母字而溯从前一代为出妻，亦弗思之甚。”他认识到，不仅孔子没有出妻之事实，子思也同样没有出妻。

其实，以“出母”表“生母”之意者，例子并不罕见。再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曰：“陈厉公，蔡出也。”就表示陈厉公为蔡国女子所生。在中国古代，有地位的男人往往要讨几房小老婆，大老婆生的孩子叫正出，小老婆生的孩子叫庶出。《红楼梦》里那个探春就因为是在赵姨娘生的，庶出，因此凤姐才对平儿叹息她是“庶出”，怕将来有人看走眼糟蹋了探春。

孔子、子思均未有所谓“出妻”之事，那么子思的父亲伯鱼如何？《礼记》也有关于子思之母的相关记载。《檀弓上》记载：

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从这里看，子思的母亲是死在卫国的，于是，有人就联想到了她是否也曾经被“出”。其实，《檀弓下》还有相关记载：

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遂哭于他室。



这里明言，死去的“子思之母”为“庶氏之母”，应当不是子思的生母。子思的父亲伯鱼在孔子去世之前就已死去，可能因为他的早死，子思的母亲才离开鲁国，或为另嫁，或为回归母家，但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她是被“出”。她去世时，子思已经收徒授学，时间已经过去多年，如果她是被“出”，而她又是作为“庶氏之母”，子思在她去世以后决不会违礼而哭于孔氏之庙。

#### （四）所谓“孔氏四世出妻”

所谓“孔氏四世出妻”是与“孔氏三世出妻”说相联系的。世人一般所谓“三世”分别指孔子及其子孙伯鱼、子思，如前所说，这种说法乃是误解典籍所说“出母”一词所造成。而所谓“孔氏四世出妻”同样如此。

所谓“孔氏四世出妻”，是在孔子及其子孙之外还有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最早说到孔子父亲“出妻”的是《孔子家语》中的“后孔安国序”。在《孔子家语》的形成与流传过程中，较早出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序”：一是西汉时期孔子后裔孔安国的“后序”；二是与孔安国的后代孔衍大致同时期的某人的序，此即我们所说的“后孔安国序”。“后孔安国序”是在解释“孔氏三世出妻”时说到孔子父亲叔梁纥“出妻”的。其中有这样的话：

自叔梁纥始出妻，及伯鱼亦出妻，至子思又出妻，故称孔氏三世出妻。

但是，“后孔安国序”的版本还有疑点。《四库全书》依据宋本翻刻的本子显得较为完整，而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却只有其中的一部分，并没有前面所引用的内容。但不论如何，这里所言“孔氏三世出妻”与通常所说不同。

也正是因为《孔子家语》“后孔安国序”的这一说法，又引出了所谓“孔氏四世出妻”之说。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后孔安国序”的作者为顾全孔子圣贤的颜面，把“三世出妻”的第一世换成了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所以，这很容易使人认为此乃弄巧成拙，把孔子的老子也牵扯了进来，使“三世出妻”成了“四世出妻”。也就是说，经过这样的解释，孔子家族上下四代都曾经“休妻”。

其实，“后孔安国序”言孔子父亲“出妻”，也不是其所说的故意进行置换，实际很可能同样是误解《礼记》材料所致。

在前引《礼记·檀弓上》中，子思门人向子思请教说：“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子思回答说：“然。”这里的“先君子”指的就是孔子。所谓“先君子”，有时指“自己或他人已去世的祖父”，有时指“自己去世的父亲”，这里应该指“去世的祖父”，即孔子。《荀子·非十二子》有相同的用法：“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荀子》中的“先君子”指的就是“子思去世

的祖父”，即孔子。子思门人向子思请教孔子是否“丧出母”，子思作了肯定的回答。人们将“出母”误解为“出妻”，这里便出现了孔子父亲叔梁纥亦曾“出妻”的误解。

#### （五）所谓“孔门出妻”说

所谓“孔门”，世人有两种用法：一是指孔子家族内部，前面所谓孔氏“三世”、“四世”之说都可谓之“孔门”；另一种说法是作为使之区别于孔子家族的概念，指的是孔子学术门派，如包括孟子在其中者即是。

前面已经提及，世人有借孔、孟说事者，遂不仅误解孔子及其家族曾经多有“出妻”之人，而且还带出了战国时期的大儒孟子。例如，有人便说，世传“孔氏三世出妻”，孔氏实为孔门，乃孔子、子思、孟子。宋人罗璧《罗氏识遗·卷四》“圣贤纲常之变”就说：“夫妇，人道之始，而仲尼、子思、孟子皆出妻。孔氏三世出妻，见《礼记》、《家语》。孟子出妻见《荀子·解蔽篇》。”

《荀子·解蔽篇》所说的所谓“孟子出妻”，其记载为：“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据清人郝懿行、郭嵩焘研究，这里当作“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未及思也”。恶败而出妻，说的是厌恶败坏自己的德操而要休妻。据《韩诗外传》卷九，孟子进门时看到妻子“踞坐”（即伸开腿坐着，不合古礼），就告诉母亲想要休掉妻子。孟母斥责他进门时没有出声提醒他人，自己违反礼制不应当休掉妻子，于是孟子自责而没有休妻。

看来，关于孟子出妻，实在没有更多的材料证明他的确那样做了。除了《韩诗外传》，《列女传》中也有叙述，内容大致相同。如果细察孟子欲休妻之事的相关记载，不难看出《韩诗外传》、《列女传》似乎都是为了突出孟母之贤。我们知道，在孟子的成长过程中，孟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孟母三迁”的故事脍炙人口，其实，所谓“孟子欲出妻”的故事与之可谓异曲同工。

在谈到孔门出妻问题时，还有人提到曾子休妻的事情。在先秦孔门儒家学者中，恐怕只有曾子是真正出妻的人。《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记载说：

参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及其妻以藜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参曰：“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终身不取妻。

曾参的后母对他缺少恩德，但曾参却仍然供养她，丝毫没有懈怠。后来曾参的妻子没有将藜叶蒸熟，曾参就休掉了她。别人认为他的妻子不该被离弃，因为不在七出的范围之内。但在曾参看来，蒸藜为食虽然是一件小事情，但她连这样的事情都做不好，更何况大的事情呢！他离弃了妻子，而且终身不再娶妻。他的儿子要他娶妻，他为了避免后

妻再做错事，也没有答应。

曾子至孝，尽心侍奉后母，历代传为佳话。为了后母，曾子出妻，也许曾子所做具有更大的合理性，更能够为后人接受，因此，在揶揄孔门、讥讽儒家“出妻”的人们中，较少引用曾子为例。

#### （六）孔子十分重视婚姻家庭

在先秦时期，有所谓“女有五不取”、“妇有七出、三不去”的说法。《孔子家语·本命解》记孔子之言曰：

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乱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恶疾子者，丧父长子者。妇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顺父母者，无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恶疾者，多口舌者，窃盗者。三不去者：谓有所取无所归，与共更三年之丧，先贫贱后富贵。凡此，圣人所以顺男女之际，重婚姻之始也。

对于所谓“七出”，《大戴礼记·本命》的解释是：“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在今天看来，孔子所说的有的具有其合理性，也有一些今天看来并不合理。

儒家重视婚姻家庭，认为婚姻家庭乃是教化之始，人伦之基，孔子同样十分重视男女之际、婚姻之始。尤其孔子所谓“三不去”：妻子有人娶而无娘家可归；与丈夫共守三年之丧；丈夫原来贫贱后来富贵。所有这些，都具有十分浓重的人情味！实际上，在儒家推崇的礼经《仪礼》之中，就有在妻子去世后丈夫为妻子“期”的礼制规定，即丈夫为妻子服丧一年。对此，《丧服传》解释说：“为妻何以期也？妻，至亲也。”在《丧服传》看来，丈夫与妻子要共同承祀宗庙，是最亲近的人。将这里的记载同“与共更三年之丧”而“不去”的规定比较，二者正好可以相互印证。

在不少人心目中，孔子儒家似乎都不重视妇女或妻子，其实，儒家重礼，绝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婚姻家庭，恰恰相反，正因他们注重“齐家”，所以更重视家庭和睦，更重视“妇人之德”。但是，儒家重视“妇德”，并非意味着他们“随意休妻”，事实上，无论孔子家族还是孔门儒者，他们并没动辄“出妻”。他们有的虽为“圣人”，但当然不会不食人间烟火，自然也有七情六欲。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探究历史的真相，既不因圣门的光环而曲意回护，也不能曲解历史的真实，只有这样实事求是的叙述，才是对他们的真正敬重。

通过探究，我们知道，不仅所谓孔子“出妻”子虚乌有，就连孔氏数代也都没有所谓“出妻”的事实。今日依据古人对《礼记》所言之误解，在批判儒家的同时，表示对

孔子三世的不齿，并以之作为儒家假道学的旁证，不仅与史籍记载无徵，而且是大错特错了。细究所以致误的原因，根本的还在于长期以来无端怀疑《仪礼》等典籍，严重后置许多相关古书的成书年代，从而影响了对于许多相关问题的正确理解。

（本文第一部分在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吴信英帮助下完成，谨致说明！）

作者介绍：杨朝明（1962— ），男，山东梁山人，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教授；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主任。

通讯地址：273100 山东省曲阜市 大成路9号 孔子研究院

联系电话：13954714156 0537—4402388

电子信箱：qfycm@126.com